

国家、群体与个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杨剑龙

提 要 “五四”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国家、群体、个人的绝对对立的思路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偏颇现象：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单地阐释为国家发展史的演绎，消弭了文学本身发展的特性；将作家的研究主观地阐释为从个人到群体的道路，消弭了对于作家个性的关注；将创作的表达武断地阐释为国家、阶级的表述，忽略个体情感体验的抒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国家 群体 个人 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0) 06-0140-03

中国新文学诞生于“五四”前后，她是与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兴盛密切相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意识到国家的衰弱与民族的觉悟有密切关联，并认识到伦理的觉悟是极为重要的。在启蒙意识的主导下，新文化先驱者们将“立人”的问题突出在诸多问题之上，将个人的解放与觉悟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大致构成了国家衰弱——群体麻木——个人觉悟的启蒙思路，从某种角度说成为国家、群体与个人的某种矛盾。“五四”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新与旧、东与西、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在极端激进甚至偏至的方式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思想传统持一种绝对否定的姿态。

自 1928 年前后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后，中国文学呈现出自“五四”时期注重文学的个性化，转变为注重文学的群体性，形成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个人与社会、个性与群体对立的思维模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种思维模式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向某种极致发展。

抗战的爆发，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焦虑的核心，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以致于出现了对于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围剿和批判。其实，我们重读梁实秋 1932 年 12 月 1 日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编者的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

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是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谁都没有好处的。”^①梁实秋如上赞同抗战反对“抗战八股”的话语，被批为“与抗战无关论”，现在读来真觉得有些“莫须有”的罪名了。在抗战的背景中，将国家、群体与个人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个人的一切必须汇入抗战的洪流中去，形成了抗战时期对立的思维、批评的模式，甚至将宗派主义、极“左”倾向都掩盖在抗战的热潮中了。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后，知识分子被放在与工农对立的角度，在阶级视阈中，知识分子被等同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等同于立场不坚定、怀疑动摇的代名词，成为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个体，而工农则以群体性的形象成为必须让知识分子仰视、崇敬、学习的对象，从此揭开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启蒙转向被改造的序幕，酿成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历史悲剧。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打破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模式，也清算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思路，但是我们却尚未梳理与反省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致于在新中国建立后对于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观点的批判，对于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等，都呈现出极端的对立性思维特征，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以致于“文革”后，在“歌德”与“缺德”的谈论中，在朦胧诗的争辩中，在现代化与现代派的争论中，都延续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延续了阶级斗争的思路。

在国家、群体、个人的绝对对立的思路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偏颇现象：一、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单地阐释为国家发展史的演绎，消弭了文学本身发展的特性。使文学史成为革命史的附庸，往往以文学史印证革命史。虽然，国家与革命必然对于文学产生某些作用和影响，但是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也有着其独特的动力与原委，文学的发展与革命的发展往往并非同步，革命轰轰烈烈之时往往并非文学兴盛之日，文学的发展既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有关，也与文学潮流、文学生态等相连。

二、将作家的研究主观地阐释为从个人到群体的道路，消弭了对于作家个性的关注。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有着一种文学进化论意识，认为文学总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在这种思路中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往往延续着“五四”时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批判否定性的评价，认为新文学是对于旧文学的进步。在研究中国现代作家时往往也采取进步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思维，将进步的作家看作是走从个人到群体的进步道路，将保守的作家看作是群众的对立面予以针砭与否定，以致于缺乏对于诸多复杂现象的深入探究，也忽略了对于作家个性的关注，那些不能融入群体中的作家往往被忽视、鄙视，如穆旦、穆木天、无名氏等作家长期被忽视。

三、将创作的表达武断地阐释为国家、阶级的表述，忽略了个体情感体验的抒写。往往从国家民族阶级的宏大叙事角度探究创作内涵，在此种思路中，我们往往误读了有关的作品，无端地从国家、阶级的视角阐释某些作品，而缺乏对于作家创作的特定语境、心态等的关注，往往产生南辕北辙的研究效果。

倘若我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时间定于1919年，1949年后的文学被归入中国当代文学，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仅有短短的三十年。如果从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那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有80多年了，倘若以1950年5月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文系重要课程之一，对于一门学科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也有了 60 年了。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关注国家、群体与个体的互动关系中，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回到文学的本体、作家的本体、作品的本体上。

一、强调于关于注文学本体发展中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嬗变研究。无论是文体的变化，还是模式的嬗变，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其本身的特性，虽然文学的嬗变与社会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文学本体自身的特性，从而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某些关键性因素，真正形成文学发展与嬗变的历史，而非以社会史革命史左右甚至替代文学史。如中国新诗的诞生固然与启蒙思潮有关，但是在其发展中与新诗本体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在“五四”诗体大解放过程中，新诗的散而无章引起诗人们的反思，出现了新诗格律的提倡，在新诗格律逐渐走向僵化板滞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活力，出现了中国新诗的象征主义运动，李金发、戴望舒的诗歌呈现出中国新诗的新面貌。在抗战背景中新诗走向了普及与民族化，又使新诗走向直白入世的现实主义主潮，九叶诗挨批的出现呈现出对于现代主义诗歌的探索，艾青将新诗的现实主义与现代色彩融合一体，呈现出中国新诗发展在文体上的整合意味。倘若不从文体上探究，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新诗发展的症候。

二、强调于关注作家个性发展中进行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特性研究。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作家个体的创造活动，其独创性、独特性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主要方面，作家从个体到群体并不能说明作家的进步，作家在融入群体中失去了创作个性却是作家的退步。戏剧家田汉 1930 年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对于自己以往的创作进行解剖批判，这是田汉加入了左联以后的文章，他批判到“过去南国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想从地底下放出新兴阶级的光明而被小资产阶级底感伤的颓废的雾笼罩得太深了”^②。从个体创作的角度，融入左联群体后的田汉的创作并非完全超越了前期，在艺术性方面却有了某种弱化的倾向。

三、强调于关注作家个体情感体验中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研究。在国家、群体与个体对立冲突的观点下，我们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总是以宏大叙事的角度，评说其创作对于表达国家意志、群体意识的作用，而往往忽略对于抒写作家情感体验的关注，以致于形成注重革命而轻视文学、注重生活而轻视生命，因此胡风批判林语堂的个性主义“既没有一定的社会的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③，提倡幽默闲适个性至上的林语堂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在将废名置于京派作家视阈中进行研究，忽略了废名用唐人绝句写小说的个性，尤其忽略了废名所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忽略废名的佛教著作《阿赖耶识论》中，难以把握废名创作的独特情感与体验，使对于废名作品的解读具有隔靴搔痒的误差。

①梁实秋 《编者的话》，北京 《中央日报》，1932 年 12 月 1 日。

②田汉 《我们的自己批判》，上海 《南国月刊》，1930 年第 2 卷第 1 期。

③胡风 《林语堂论》，上海 《文学》，1935 年第 4 卷第 1 号。

作者简介：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200234

责任编辑 韩 冷